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组织机构是整个社会学体系的一个部分，一个子系统。同时组织又是一个整体，进行着决策。组织作为一个小社会的子系统，通过成员与社会这个相对较大的体系进行交流。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必须清晰地可辨认界限，只有所研究的组织中（按其组织的复杂性）

福利社会学

个体系的建立取决于决策的重要程度和成为反应机制的成熟程度。两个路径进入网络社区后，决策在新闻传播、论坛、博客、博客等形式的网上社区内都和网上社区之间形成灵活的传播和热播。在经过辩论的与决策传播的过程后形成广泛共识并被裁剪或自觉地集体行动。次在决策的与行动共进或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其中寄语传播并启动融合进程，催化决策中的共识）。直指并作用于政府决策过程中决策目标的确定，决策方案的制定，进而促进最有影响力的执行，直指决策的执行就是下一个认识的层次。决策而正面情和执行的情势情感成为一个新的认识。一方面通过也就意味着直接面对决策执行。另一方面则必须通过对他执行的评价从而进入网上公共领域。通过新一轮的辩论与跟帖将决策执行从公共领域、通过新一轮的辩论与跟帖将决策执行从公共领域开始，随着从正面反馈对决策做出评估与重新调整，从而进入新一轮决策过程。

真正而具体的网上公共领域，进而形成决策方案的执行和落实进程（或者具体地或成员不高等级）。另一个是直接进入网络社区（网络社群），并在网上社区内

组织机构是整个社会学体系的一个部分，一个子系统。同时组织又是一个整体，进行着决策。组织作为一个小社会的子系统，通过成员与社会这个相对较大的体系进行交流。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必须清晰地可辨认界限，只有所研究的组织中（按其组织的复杂性）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是开放的领域。

从宏观上，大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大大提升，从而为组织机构的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的不足、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等。

因此，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决策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的提升：通过改进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提高数据采集与处理效率。

2. 数据质量的保证：通过建立数据质量评估机制，确保数据质量。

3. 数据分析与决策的结合：通过建立数据分析与决策相结合的模型，实现数据驱动决策。

4.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通过建立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保障数据安全。

5. 数据伦理与社会责任：通过建立数据伦理与社会责任机制，确保数据使用符合道德规范。

正确的方向和执行的有效性又成为一个新的认识，一方面通过传统辩论直接反映的政府，另一方面则议程又经过传统媒体进入网上公共领域，通过新一轮的辩论与跟帖进入公共领域，从而对决策提出评估。

主编 杨伟民

社区为媒介的网上公开领域，进而完成公权事论者对决策过程（或者其他组织个人的决策）。另一个是直接进入网络社区（网络社群），并在网上把公众意见这直接带入决策过程，形成

的公众舆论态势和目标和制订方案构成一定的影响，这个联系的建立取决于公权的程度和网民对反决策的厌恶程度。

两个路径进入网络社区后，决策在新闻传播、论坛、博客、博客等形式的网上社区内都和网上社区之间形成灵活的传播和热播。

在经过辩论的与决策传播的过程后形成广泛共识并被裁剪或自觉地集体行动。

次在决策的与行动共进或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其中寄语传播并启动融合进程，催化决策中的共识）。

直指并作用于政府决策过程中决策目标的确定，决策方案的制定，进而促进最有影响力的执行，直指决策的执行就是下一个认识的层次。决策而正面情和执行的情势情感成为一个新的认识。一方面通过也就意味着直接面对决策执行。另一方面则必须通过对他执行的评价从而进入网上公共领域。通过新一轮的辩论与跟帖将决策执行从公共领域、通过新一轮的辩论与跟帖将决策执行从公共领域开始，随着从正面反馈对决策做出评估与重新调整，从而进入新一轮决策过程。

真正而具体的网上公共领域，进而形成决策方案的执行和落实进程（或者具体地或成员不高等级）。另一个是直接进入网络社区（网络社群），并在网上社区内

中国人大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福利社会学

主编 杨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利社会学/杨伟民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6578-3

I. ①福… II. ①杨… III. ①社会福利—教材 IV. ①C9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436 号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福利社会学

主 编 杨伟民

Fuli Shehui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6.5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9 000

定 价 29.80 元



前 言

近年来，国内已经陆续出版了几本以“福利社会学”为名的教科书。这标志着在中国的社会学领域，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正在萌芽。本书基本接受国内有关学者对福利社会学的界定，“福利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福利、探讨福利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分支学科，它是一门研究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社会福利产生与发展、社会福利设置与安排等规律的社会学学科”^①。但是，在此前提之下，与国内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一种社会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与个人福利有关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制度。

福利作为人的需要得到适度满足的一种状态，其实现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能够获得的经济资源有关，又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同时在现代社会也与国家政策有直接关系。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里，与福利有关的社会制度、国家政策都是整个制度体系、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政策科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学者对福利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个从不同角度对福利问题进行分析、解释的学科群。其中，与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地位相对应，福利经济学是形成最早、地位最显赫的学科。另外，由于20世纪以来国家对公民福利直接干预的增强，主要以国家的福利政策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政策也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起来。该学科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对国家是否应该介入公民福利，国家如果介入则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福利政策，国家的福利政策与其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传统的相互关系如何等方面进行探讨。与社会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联系又与自身独立的实践活动发展历史有关的社会工作、社会行政，也在这个学科群中占有重要位置。

^① 景天魁等：《福利社会学》，23~2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至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福利的研究，从总体上说，也是成果卓著、影响广泛。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联系公民身份的形成提出的社会权利理论。米什拉（Ramesh Mishra）在 1977 年出版了至今仍很有影响的《社会与社会政策：关于福利的理论视角》，其学科定向明确为“社会学的（sociological）”。^① 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不仅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且使用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福利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自觉。米歇尔·佩隆（Michel Peillon）具体地论证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福利问题的意义。他认为一个自足的社会学框架应该既可以把福利制度和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情景之中，同时又能够抓住福利活动的内在动态结构。如果像社会行政那样只按照自身的术语来检视福利制度，则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而现代化取向的那些宏大的理论往往又把福利体系直接嵌入既有的社会关系里，把整个社会结构化为一体。只有来自社会学理论的福利分析能满足这种双向要求，既把社会福利置于广阔的社会情景之中，又不妨碍对福利领域特殊性的关注。^②

但是，如果我们将从社会学角度对福利问题的研究称为福利社会学，那么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还是很弱小的。目前国内出版的以“福利社会学”为名的书籍屈指可数，在国际社会名为“福利社会学”的文献也寥若晨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其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体系还没有成形。福利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与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有直接关系。社会政策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起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对公民福利承担了较多责任，以至发展成“福利国家”不无关联。这两门学科关注的和给出的个人福利维持与提高的方向分别为：一个是市场，个人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市场的活动获取所需的福利资源；另一个是国家，个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从国家获得哪些私人物品供给。近年来从社会学角度对福利问题的研究受到比较自觉的重视，与福利多元化观念的提出恐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福利多元化就是肯定各种社会结构单位都具有增进其成员福利的功能。

本书主要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福利问题，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广泛解释力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既关注行动者的种种特征，也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同时这一理论还能够为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说到底社会学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而社会在本质上是人们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体系。由于人们交往的内容和频繁程度不同，在交往中形成的感情不同，通过交往能够形成的共同或相近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范围、利益关联的范围不同等，人们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体系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类型。个人的福利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按照 G. L. 斯文德森（Gunnar Lind Haase Svendsen）和 G. T. 斯文德森（Gert Tinggaard Svendsen）的看法，社会资本是一种“生产性的因素”。

^① See Ramesh Mishra, *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7.

^② 参见米歇尔·佩隆：《布迪厄的“场域”和福利社会学》，载《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通讯》，2002（15）。

只不过过去由于经济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这种生产性的因素被忽视了。^①社会资本既然是一种生产性的因素，则必然与福利的增进有关。

社会资本理论就是研究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的，以及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的动用显然是与个人福利有直接关系的。同时，社会资源的动员、利用与个人行为、社会规范、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等又是密不可分的。而个人的社会行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恰恰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本书将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基本分析对象。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者的行为方式、遵循的行为规则、通过互动形成的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等，探讨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有助于个人福利的维持和提高，并根据这样的“实然”推断“应然”和如何“使然”。

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包括社会资本理论，其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的“实然”。本书就是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在研究“实然”方面取得的成果，更具体地分析个人行为、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与个人福利的关系。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如果在社会生活实际中，有些个人行为、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社会行为规则有利于维护和提高个人福利水平，而有些则不利于个人福利水平的维护和提高，即在个人行为、社会关系网络与个人福利之间存在某种规律，那么，我们自然就要探讨，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能否变成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如何促使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向着有利于其成员福利增进的方向转变？这就涉及了“应然”和如何“使然”。

实际上，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既追求价值中立，又不可能是彻底的价值中立的，至少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嵌入了研究者的意愿、偏好，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然”和“应然”本身并不能截然分开。这使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研究者选择的“实然”比较清楚地呈现出“应然”，但研究者不明确给出价值判断；另一种情况是，研究者根据自己揭示出的“实然”，给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社会现象本身有好坏、对错之分，尽管不同的人对何谓好坏、对错的看法不同，研究者如果只是单纯地呈现“实然”，则很有可能对读者形成误导。仅就社会资本理论而言，对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的、可以被动员的资源的研究，必然涉及利用这类资源能够为行动者带来什么的问题。因此，在对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中的社会资源进行分类描述和分析时，研究者呈现的“实然”就包含“应然”。根据是否进行了“应然”方面的价值判断，以及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与个人目的的关系还是与社会整体的关系，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理论可以分成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区别的两种。

前一种以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代表，后一种以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代表。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社会关系网络与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但是，该理论对于个人利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实现个人目的的公正性缺乏必要的关注。如果关注实现个人福利或实现个人目的的公正问题，就涉及公正的社会规则、制度的形成问题。在这个方面，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对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关

^① See Gunnar Lind Haase Svendsen and Gert Tinggaard Svendsen,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p. 1,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系网络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如果探究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增进个人福利，那么，在福利研究领域，包括对如何维护和提高个人福利的实践活动的研究，人们已经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只靠自己和自己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很难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而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和共识，我们对如何“使然”问题的讨论，是以社会工作者介入某种社会关系网络会怎样为重点的。

我们之所以主要探讨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会使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工作者如何通过改变和建构社会关系促进个人福利的改善，不仅是因为本书将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教科书，更主要的是因为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似乎令有改革意识的人陷入“绝望”。^①因为该理论研究的结果证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制度绩效的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在上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资本自古就贫瘠的地方至今仍然贫瘠。尽管，帕特南指出“绝望”的人是对他的理论产生了误解，他接着给出了“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的“实然”。但是，帕特南对“实然”的揭示是不充分的。根据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社会工作主要是通过对人的行为、观念给予潜移默化的影响发挥作用，是一种通过人的社会化、继续社会化过程，使人的行为、观念发生变化的工作。从形成和发展社会资本的角度看，社会工作这种实践活动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改变制度更有效。这就是说，本书不单单是利用社会资本的既有研究成果，而是要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与个人福利关系的研究，对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一些补充性的观点。

以上是对本书逻辑框架的概述。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下，本书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我们关于福利和福利多元化的基本看法；两种社会资本理论各自的特点；社会关系、社会规则的自生自发与人为建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关系的断裂与连接；家庭、非正式关系网络、社区、工会、志愿者组织、企业等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及其与个人福利维护和增进的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工作者能够发挥的作用；社会制度与社会福利等。

我们绝不认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福利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只是愿意为这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希望本书能够成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工作技能之间的一座桥梁，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了解社会学理论提供一点帮助。因为“应然”和“使然”必须以“实然”为根据。

杨伟民

2012年3月于苏州独墅湖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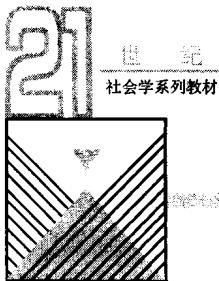
^① 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2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目 录

第一章 福利与福利的多元化	(1)
第一节 福利与个人需要满足	(1)
第二节 社会与社会福利	(8)
第三节 社会福利多元化	(15)
第二章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	(29)
第一节 资本与社会资本	(30)
第二节 社会关系与社会关系网络	(36)
第三节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47)
第三章 两种社会资本理论	(51)
第一节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51)
第二节 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61)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社会规范	(73)
第四章 社会变迁与社会整合	(82)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社会进步	(82)
第二节 社会变迁与社会整合	(88)
第三节 社会整合与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97)
第五章 控制、竞争、合作与社会资本	(109)
第一节 控制与社会资本	(109)
第二节 竞争与社会资本	(118)
第三节 合作与社会资本	(126)
附录 适度友善与社会规范之必要性的一个有趣的实验	(130)

第六章 家庭中社会资源的获取与扩展	(136)
第一节 家庭	(136)
第二节 家庭社会资本	(141)
第三节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家庭主要关系	(144)
第四节 增进家庭福利的措施	(149)
第七章 非正式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源的维持与获取	(156)
第一节 非正式关系网络	(156)
第二节 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	(161)
第三节 社会工作推动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形成	(170)
第八章 社区中社会资源的获取与扩展	(176)
第一节 社区	(176)
第二节 社区社会资本	(182)
第三节 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路径	(190)
第九章 工会中社会资源的维持与获取	(195)
第一节 工会	(195)
第二节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工会	(201)
第三节 社会工作对工会的介入	(208)
附录	(210)
第十章 志愿者组织与社会资本	(214)
第一节 志愿者组织	(214)
第二节 社会资本、社会工作与志愿者组织	(220)
第三节 社会资本视角下志愿者组织分析	(225)
第四节 社会工作重构志愿者组织社会资本的途径	(227)
第五节 社会工作介入效果评估	(231)
第十一章 企业中社会资源的获取与扩展	(234)
第一节 企业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	(234)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	(236)
第三节 增进员工社会福利	(243)
后记	(251)



第一章

福利与福利的多元化^①

福利社会学，作为以福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中的一分子，必然以福利为核心概念。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必然将福利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进行探究。这种社会学的探究方式，必然涉及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中福利的状况、特征。所谓福利的状况、特征，既是指其状态，也是指其维护和改变。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模式都可能为人们维护和改善既有的福利状态提供机会和条件，因此，人的福利的维护和改善是与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模式相关的。这也就是所谓的福利的多元化。本章主要讨论福利和福利的多元化问题，在讨论福利的多元化过程中将涉及社会福利和国家福利。

第一节 福利与个人需要满足

一、福利的基本含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福”的概念，没有福利的概念。福的含义：一是指人们关注的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令人满意。如《韩非子》卷六：“全寿富之谓福”；二是指能够得到护佑，即得到祖先、神、佛等的护佑。如《说文解字》将“福”直接解释为“祐也”。护佑的目的自然仍是能够得到“全寿富”。当然，在我们将英文的 welfare 译为“福利”时，其仍然包含中国的“福”之含义，仍然是指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状态，令人感觉幸福的状态。但是，仔细追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与“福利”、“幸福”有所不同。

^① 本章的有些内容已经在杨伟民撰写的《社会政策导论》中阐述过了，但是为了本书内容上的完整，特在此进行重新阐述。在重新阐述的过程中，对有些问题给出了更严谨、更详细的解释。在内容的安排上也根据本书内容的整体逻辑关系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虽然“福”、“福利”、“幸福”都是人所追求的东西；但是，根据《韩非子》对福的解释，“福”似乎是可以根据某些外在的标准来衡量的，但“福利”、“幸福”不是完全可以用客观指标来衡量的。当代西方学者一般都是将福利与快乐、幸福相联系，但也指出福利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米吉里（James Midgley）解释 *welfare* 的含义时说，它来源于一个古老的词汇 *farewell*，是人们分手时用来表达良好祝愿的，意思是“旅途一帆风顺”，“祝愿生活美好、幸福”。而他自己则认为福利“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一种良好状态（well-being）”，“满意或实现也能够用于描述这种状态”^①。《韦伯斯特新世界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将 *welfare* 解释为“一种健康、幸福和舒适的良好状态”。马歇尔（T. H. Marshall）更明确地说，“福利”（*welfare*）这个词意味着比它的姐妹词语“财富”（*wealth*）更个人化、更主观。福利与对良好状态（well-being）的体验和良好状态的形成条件有着复杂的联系。说一个人活得好，是指他实际好并且感觉也好（*doing well and feeling well*）。^② 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认为“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人的幸福”^③。

综合以上对福利的各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福利是个人感觉自己的实际生活状况良好，因而产生了一种舒适、幸福的主观感受的状态。这种舒适、幸福的主观感受的形成是与个人需要的满足相关联的。一般来说，一是个人的基本需要必须得到适度的满足，才可能体验到快乐、幸福；二是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越高，个人的福利实现的水平也就越高。而个人需要的满足必须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为基础，福利是在这种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心理习惯、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等形成的对自己所处的实际状况的一种比较好的判断和主观感受。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主观感受。有的人可能对自己所处的实际状况形成一种比较好的判断和主观感受；而有的人则可能形成很不好的判断和主观感受。

因此，我们可以将福利界定为个人需要得到适当满足的一种生存状态。一般来说，这种状态的实现会使人感到快乐、幸福，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福利是指个人因自己的需要得到适当满足，而感觉快乐、幸福的良好状态。

但是，把福利与个人需要、与快乐、幸福相联系，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其一，无论是人的基本需要还是更广泛的需要的适度满足，都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这既包括必要的物质资源，也包括其他非物质性的条件。对这些物质资源和客观条件的概括，我们可以借用罗尔斯（John Rawls）的“基本善”^④ 概念。他的“基本善”包括“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或自尊。他认为这是“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想要的东西”，假定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他们应当首先维护他们的自由和自尊；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什么，他们常常需要更多

^① James Midgley, *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 p. 4,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7.

^② See T. H. Marshall, *Social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2,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publishers) Ltd, 1985.

^③ [英]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1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

^④ “基本善”的英文是 primary goods，译为基本物品可能更合适。

而不是更少的其他基本善”^①。而这些条件和资源的获得既与个人努力有关，也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这个社会环境，包括家庭成员之间能否平等对待、相互扶助，也包括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能否彼此关心、互助，更包括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征、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制度等。这实际上表明，个人福利与社会之间存在关联。

其二，人的快乐、幸福不仅仅源自个人需要的满足。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人类发展的内在要求绝不是让人成为自私自利之徒，只专注于可怜的自我存在而对其他一切麻木不仁，而是在于更高的追求，即充分体现人何以为人的实质。”^② 人的快乐、幸福还有着与他人、与自己认同的共同体的利益、价值有关的多种来源。也就是说，个人福利的实现自然能够导致人的快乐、幸福，但是，人的快乐、幸福并不完全等于个人福利的实现。人的快乐、幸福不仅来自个人福利的实现，与他人福利的实现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人的快乐、幸福既来自个人需要的满足，也来自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他人提高福利水平。

其三，不同的人对何谓基本需要、何谓基本需要的适度满足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注重物质生活状态的良好，物质条件如衣服、食品、住房、医疗、必要的照顾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有的人强调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接受教育的条件、社会参与的机会、政治参与的权利等。因此，个人评价自己的福利水平时，当然可能主要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主观感受做出判断，但是，能够以他人的观点作为参照也是必要的。一个人（作为自己本人或一个机构的代表者）评价他人的福利水平时，既要以社会通行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也要适当地考虑有关个人的特殊状况。

二、福利与行使功能的能力

将福利与行使功能的能力联系起来的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虽然因为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在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实际上，其对福利问题的研究既达到了哲学的层次，也具有社会学的视角。因此，相比之下他对福利含义的解释更全面也更具有哲理性。当然，他对福利含义的解释，也有需要讨论的地方。

阿马蒂亚·森说，自己对福利的解释采用的是“处理个人利益的能力方法”，这种方法关注的是“根据个人获得各种作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且具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来评价利益”^③。由此可见，阿马蒂亚·森是把个人福利视为个人利益、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个人获得的具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的一部分。对阿马蒂亚·森用能力方法解释福利的过程，我们可以分两个步骤来理解。

他的“能力方法关注的最原初概念是‘功能’”。“福利的主要特征可以根据一个人怎样‘行使功能’来把握。”这是他的第一个步骤。关于功能，阿马蒂亚·森“是从非常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个术语的，指的是一个人的各种活动（doings）和特征（beings）。“它们可以是活动（如吃或读或看），或者是生存或存在状态，例如营养良好、没有疟疾、

^①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93、62、3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 [英]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31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③ [印] 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22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不为衣着的寒酸而感到羞耻等”^①。可见，他对福利的解释，同样既包括个人的主观感觉，也包括客观状态。

阿马蒂亚·森之所以“根据一个人怎样‘行使功能’来把握”福利，是因为在以评价为目的的各种方法中，他自己赞成的是“集中注意人们努力实现的实际生活的状态（或者进一步，集中注意人们实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实际生活的自由）”^②的方法。而一个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是否良好，既与个人拥有的客观条件有关，也与个人自身的客观状况有关，更与个人价值观念，即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判断自己的状态有关。以一个人怎样行使功能来把握其状态，既能够避免根据主观感觉来界定个人状态，也能够避免仅仅以一个人拥有的收入或其他外在资源和条件来衡量其状态。“‘福利’并不是她所支配的某种外在于她的东西，而是她所获得的内在于她的东西。她所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活动（doings）和特征（beings）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③

然而，阿马蒂亚·森对福利概念的分析解释还不止于此。他的第二个步骤是“把注意力从个人的实际功能转向他（她）的行使功能的能力”。“福利的根本特征是获得有价值的功能的能力。”从功能转向能力的前提是，他将福利进一步分为福利成就和福利自由。个人的功能实现仅代表个人的福利成就。但是，同样的福利成就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实际福利状况，还需要考察一个人是否具有获得某种福利状态的机会。阿马蒂亚·森界定福利含义的这第二个步骤是极有价值的，但是他选择的“能力”（capability）这个词却有些毛病，他自己也认为也许“可以选择一个更好一点的词。采取这个词是为了表示个人能够做或成为的事物的不同组合——他或她能够获得的各种‘功能’”^④。他所说的“能力”实际上指的是有条件或有真实的机会。因此，我们用“一个人有真实机会实现的有价值的功能”来表示阿马蒂亚·森对福利概念的界定。

他通过一个例子说明了福利自由的重要性。如果两个人都在挨饿，那么从福利成就方面看，两个人没有什么区别，都在遭受挨饿的痛苦。但是，一个人挨饿是因为贫穷，无法得到食物；另一个人挨饿是出于宗教信仰在进行斋戒，而不是因为贫穷而无法得到食物。阿马蒂亚·森认为，从具有的能力（即真实机会）方面看，后者具有选择挨饿还是不挨饿的自由，前者则没有这样的选择自由。不仅如此，前者更没有选择斋戒的自由。“这是一个在分别评价两个人的福利方面时相关的差异，尽管它并不必然是两个人获得的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异。在判断一个人的利益（以及他或她所得到的那种‘待遇’）时，我们必须承认福利自由的重要性。”“个人的福利方面要求——分别根据自由和成就——应得到双重的考虑。”^⑤

阿马蒂亚·森如此界定福利概念，与以快乐、幸福界定福利相比，显然是向更具体的、可进行操作化测量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有价值的功能性活动”视为评价个人状态的中间性概念。而且，这个概念与其他的中间性概念相比，不是将

^① [印] 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228、14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② [印]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6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③ [印] 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14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④ 同上书，149、148、227页。

^⑤ 同上书，150、151页。

福利视为外在于一个人的东西，而是视为内在于一个人的东西。但这内在于一个人的东西又不是人的主观感觉，而是人的实际状态。因此，这样界定福利概念的含义对于全面考虑与福利相关的各种因素也具有重要意义。

福利的本质虽然不包含实现福利的手段，但是从个人有真实机会获得的功能性活动角度界定个人福利，就可以避免只根据一个人拥有的外在资源和条件来评价其福利水平的问题。一个人实现其有价值的功能不仅与其拥有的外在资源和条件有关，也与其自身特征有关。这样的个人特征也属于能否实现某种功能的客观条件。这就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我们在发展一种处理福利的方法时必定不能无视重要的个人参数的作用”。从功能方面界定福利没有将福利仅仅归结于与个人特征完全无关的客观标准，而是认为“会造成相关的客观差异（而且其他人也能看到这种差异）的个人特征也能够被作为参数嵌入评价函数中，而又不会丧失客观性”^①。

很显然，一个人的功能实现程度必定与其拥有的必要的客观条件有直接的关系，如营养良好必定与其拥有的食品、饮用水等的数量和质量密不可分。同时，一个人的功能实现与其个人特征也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将物品‘转化’为功能时的人际差异是极其常见的。举例来说，食物消费与良好营养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就随着以下因素而变化：(1) 新陈代谢率；(2) 体形；(3) 年龄；(4) 性别（如果是妇女，是否怀孕或哺乳）；(5) 活动水平；(6) 气候条件；(7) 寄生虫病的存在；(8) 得到医疗服务的途径；(9) 营养知识和其他的影响。”^② 阿马蒂亚·森列举的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客观性的个人参数、自然环境、社会能够提供的条件等。

除了一个人拥有的外在于自身的条件或资源，阿马蒂亚·森把影响个人状况的因素概括为：个人的异质性、环境的多样性、社会氛围的差异、人际关系的差别和家庭内部的分配等五个类别。^③ 对于这些影响一个人有真实机会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的因素，我们也可以概括为：他或她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可以分成一般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区、家庭的具体情况。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小社会环境。

通过一个人拥有的行使有价值的功能的空间来把握福利，一方面将福利的评价空间与实现福利的相关因素区分开，另一方面指出除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与个人福利直接相关的是两类客观条件——非个人性的客观条件与个人特征。前者被阿马蒂亚·森称为“富足”或者被罗尔斯称为“基本物品”。后者即不能无视的“重要的个人参数的作用”、“会造成相关的客观差异的个人特征”。这样的立意和研究路径当然是极具价值的。

个人有真实机会实现的有价值的功能包括人的各种活动（doings）和特征（beings），这些活动和特征是有指向的。人们从事某种活动、追求实现某种状态，视之为有价值的功能，其根本指向是快乐、幸福。阿马蒂亚·森之所以反对将福利定义为快乐、幸福以及欲望实现，与他过于低估了个人对自己处境的感觉和判断能力有关。

^① [印] 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145、14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② 同上书，147页。

^③ 参见 [印]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59~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阿马蒂亚·森在很多地方都指出了一些处于不幸之中的人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使自己形成快乐、幸福的感觉，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认为这样的人拥有良好的状态。“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的绝望的穷人、劳作于剥削经济制度之中的被践踏的工人、屈服于社会中深刻的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妇女、被粗暴的权威主义政府所压制的公民，这些都可视为剥夺。他多少可以从一些小小的成功中获取一些快乐，他也可以考虑到可行性并调整他的欲望（从而有助于他调整过后的欲望实现）。但即使调整成功也并不能掩盖他被剥夺这一事实。快乐或欲望的测度在反映这些个人的实质性剥夺的范围时有时特别不合适。”^①“唯一地集中注意心理特征（诸如快乐、幸福或愿望），在进行福利或剥夺状态的人际比较时，有时会具有特别大的局限性。我们的愿望和享受快乐的能力随具体环境而调整，特别是在逆境中我们会调整自己以使生活变得易于忍受一些。”^②总之，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当一个人自己感觉满足、满意时，用某些客观指标衡量，这个人不一定处于福利状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阿马蒂亚·森过于夸大了在感知快乐、幸福上的人际差异。虽然在个人的主体特征和拥有的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即使经过理性评价、经过反思，个人的主观感觉、心理状态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将人们之间的这种主观感觉与客观条件的差别进行对比，对于调整个人“对事实的主观判断”也是有意义的。很少有人对自己的状况十分满意，然而，当一个人看到比自己的个人特征和客观状况都差的人能够快乐地生活，就有可能调整自己的“对事实的主观判断”。更重要的是了解人们在拥有一定的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的真实机会时，对自己的福利状态的主观感觉、满意程度，对通过讨论在社会选择中达成共识是有必要的。

此外，由于人的快乐、幸福并非完全来源于自我福利的实现，如果我们不以个人需要来限定个人福利的范围，就很难清楚地表达人对自我福利的追求与对其他目标的追求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认为，从概念上说，有必要以个人需要来界定个人福利的范围。参照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的解释，在本书中，我们把福利界定为：与人的需要得到适当满足有关的一种良好状态。这种状态的实现会使人感到快乐、幸福。个人的福利状态包括以下方面：个人有适当的机会实现和发展自己的能力；有机会通过参与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使自己拥有一定量的物质资源，至少拥有能够满足根据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发展水平形成的基本需要的消费资料；有机会参与社会的政治、文化活动和其他活动，并使自己的各种精神需要及社会交往需要得到适当的满足。

三、对福利含义的日常理解

虽然在学术界和日常生活中福利都是一个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但是人们对它的含义的理解却存在明显的分歧。诺曼·巴里（Norman Barry）在其《福利》一书的第一章，对政治思想中的福利观念进行梳理后认为，对于福利，“尽管也许存在某种最小限度的共识，认为正是这个概念描述了幸福、满足、救济（与那些关心责任、政治义务和秩序的人总体

^① [印] 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65、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印]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上形成对照)，但是，在此共识之外，我们进入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争议领域”^①。

然而实际上，诺曼·巴里对人们在福利概念上“共识”的概括，已经反映了人们对福利的含义理解上的主要分歧。他所概括的共识中包含了两种含义：“幸福”、“满足”基本上属于个人的状态，而且是一种相对而言的高水平的福利状态；而“救济”则属于他人、机构为了维持和实现一个人的相对较低的福利水平所采取的措施、行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一般着眼于状态意义上的福利，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到福利时，往往是指“救济”，而且通常还含有对救济水平过高的批评、报怨。例如人们常说的“福利依赖”、“福利养懒汉”等，基本上说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成员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而是依靠家人以外的他人、社会团体、国家机构提供的资源生活，尤其是指依靠国家机构提供的资源生活。准确地说，这是属于福利的社会供给或国家供给。但是，福利的社会供给或国家供给，又不一定是“救济”，只有这种供给是提供给穷人的时候，人们通常才称之为“救济”。当福利的社会供给或国家供给不仅仅是提供给穷人，而且还提供给更多的社会成员时，人们通常是不会称之为“救济”的。

所以米吉里认为福利“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一种良好状态”，但是，“今天它更多地被狭义地用于慈善活动或政府对穷人提供救助的社会项目中。以这种方式使用，它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高贵的含义，而且现在经常作为一个具有侮辱性的词汇被滥用”^②。

对于福利的含义，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理解，这可能主要是在我们国家，即将福利理解为工作单位在薪资之外为员工提供的服务和实物。如工作单位为员工提供的免费午餐、组织的外出旅游、节假日发放的食品和用品等，都被称为“福利”。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利，往往被视为一种荣耀。

其实，且不说将福利解释为救济是否具有侮辱性，也不说能够从工作单位得到薪资之外的服务和物品是否是一种荣耀，日常生活中对福利的这些用法的关键问题是将作为个人状态的福利与为实现福利状态进行的努力混淆了。把福利解释为一种良好状态和把福利解释为为实现良好状态进行的努力，属于不同的视角。从为实现良好状态进行的努力方面解释福利，通常将个人为实现自己的福利状态进行的努力排除在外了。实际上，仅就为实现个人的福利状态进行的努力方面来说，个人自己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有责任感有能力的人，努力把自己的潜在能力变成实际能力并努力运用，是实现个人福利的主要途径。当然，个人的努力与其能否从社会中获得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也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把个人努力与社会、国家提供的帮助、提供的机会和条件加以区分，对于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我们认为福利是指个人因自己的需要得到适度满足，因自己有实际机会行使有价值的功能而感到快乐、幸福、满意的良好状态。由于个人实现良好状态既需要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其他社会成员通过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的方式提供的必要帮助，将后面这些来自社会的、有助于个人福利状态实现的帮助统称为社会福利可能更为合适。因为，这反映了社会中的其他人、其他机构，为满足个人需要做出的努力。

^① [英] 诺曼·巴里：《福利》，1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② James Midgley, *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 p. 4,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7.

第二节 社会与社会福利

一、社会的多种含义

社会的形成或存在离不开一定数量的个人，但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更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例如，马克思对社会的解释，“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①。社会是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的，而人们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人们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人们或者需要共同从事一些活动，或者各自所从事的活动之间存在关联。因此，社会指的是由复数的个人的持续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其中持续的互动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关键，社会关系以过去的持续的互动为基础，又为未来的互动提供了可能性（机会）。互动的持续以现在为中心，同时又涉及过去和未来。如果把社会的概念与人们的社会交往相联系，社会的范围就是人们的相互交往能够达到的范围。

但是，实际上现在人们说到社会的时候，又往往不太追求人们相互交往的实际范围，而是以某种人为划分出来的地域边界作为一个社会的边界，尤其以国家的领土范围及其所包括的公民为社会的边界。吉登斯曾对这两个类别的社会含义进行过区分。他说，“‘社会’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有具体界限的系统，一是指一般性的社会交往”^②。对于前者，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学家的‘社会’，至少在现代性的时代就是指民族国家，但这通常是隐含的等同，而不是外显的理论化等式”^③。其实，现在普通人说到社会时，一般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如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当然，这不仅是指单一民族的国家，也包括多民族的国家。

尽管从人们的社会交往角度看待社会，很难准确、清楚地划定社会的具体界限，尤其是处在全球化时代。但是，如果从交往的频度、关系的密切程度、公共事务管理系统的作用范围，以及语言、文字、文化传统、情感认同、价值共识等方面考察，还是可以划出社会交往系统的具体界限。例如，由自然环境或人为划分形成的、包含地域因素的社区，各种形式的组织、团体，都可以看作有具体界限的社会系统。因此，社会可以是一个被用来指称不同层次的人们相互交往的系统的概念，即可以指全球社会、国际社会，也可以指与国家范围等同的社会，还可以指各种区域性社会和分散在不同地区但不包括有关地区全部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与国家范围等同的社会中，国家之内各个层次的社区、不同规模的社会关系网络，又都可以被视为社会的结构单位。

另外，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社会自然又涉及国家的概念。人们对国家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这里仍然采用吉登斯的说法：“‘国家’是个含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state-based society）的整个形式，也可以指这一社会中特定的政府体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4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